

专题

◀ (上接3版)

不过,玄奘对于驻锡弘福寺并不满意。玄奘在长安并未久留,即赶赴洛阳拜谒唐太宗。太宗在洛阳官仪鸾殿接见玄奘。《三藏法师传》用了相当篇幅详尽地记载了这次活动,尤其是两人之间的询问、对答。太宗对玄奘的礼遇并不代表他全力支持佛教运动,而是采取实用主义的作法。汤用彤早年指出,所修功德,多别有用心。只不过顾及到佛教是一个影响很大的宗教势力集团,疏离这股势力恐有不必要的麻烦。当玄奘希望能在嵩山少林寺翻译佛经时,被太宗当场拒绝,对玄奘看重的译经事业太宗并不以为然。因此得到朝廷甚至皇帝的支持,在玄奘看来是非常重要的,上书皇帝要求颁赐序文也是一种取得支持的重要策略。刚开始请求太宗赐序的请求,并未被理睬。接着,借《西域记》修成之际,再次上表请赐。太宗对佛经请序再次拒绝,仅云“新撰《西域记》者,当自披览”。在王华官见到玄奘时,又提旧事,劝其还俗。在大臣长孙无忌、褚遂良等人的斡旋下,玄奘重提赐序时,这次受到太宗的应允。不久,序文制成时特地举办盛大集会,太宗亲临庆福殿,百官侍卫,由弘文馆大学士上官仪,当众宣读太宗赐序。这篇朗朗上口的四六骈文很可能就出自上官仪之手。

收到太宗赐序,玄奘上表致谢,太宗作答。太子李治作《述圣记》,玄奘又致谢书,李治回答书,如此往复,使盛况达到空前,佛界沸腾。彦棕描述万众欢腾的情景:

自二圣序文出后,王公、百辟、法、俗、黎庶手舞足蹈,欢咏德音,内外扬播,未及浹辰而周六合,慈云再荫,慧日重明,归依之徒波回雾委。所谓上之化下,犹风靡草,其斯之谓乎!如来所以法付国王,良为此也。

在得到二序文后,弘福寺寺主圆定,请求将序文镌刻于金石,藏于寺宇,太宗同意这个要求。“后寺僧怀仁等乃鸠集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,勒于碑石焉”。

虽然唐太宗对于佛教态度令人难以琢磨,但弘福寺寺主圆定为首的长安僧侣们的政治动机却是显而易见的,他们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。镌刻碑文应该是大家的共识,鸠集王羲之之书迹成文却是一天才的想法,或许这一灵感的闪现就出自圆定,他将集字工作交给书法家怀仁。

《集王圣教序碑》是用行书书体制作的碑石。行书最早的用途并非正式场合,唐以前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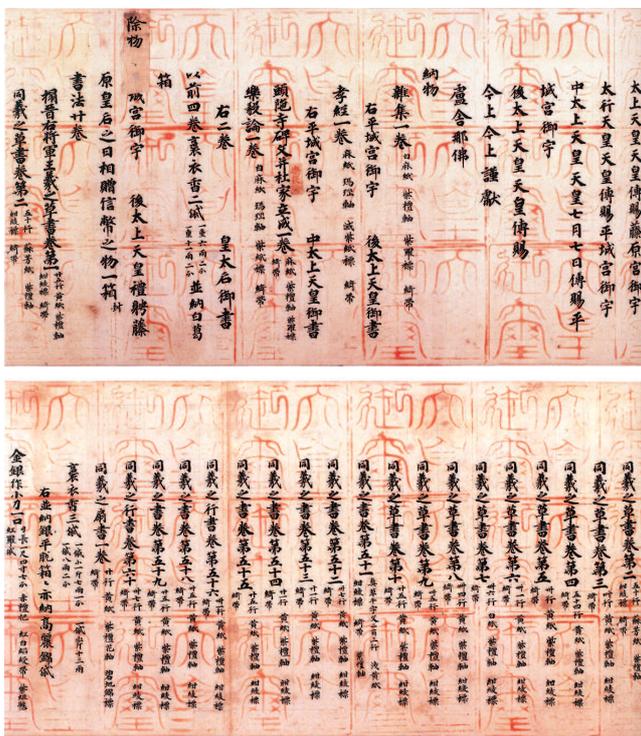


图4 正仓院展《东大寺献物帐》

石用字行书也是罕见的。最早的行书碑有记录者始于隋朝,据记载有李渊、虞世南等人的行书碑。王羲之父子使行书书体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,他们在世之时就成为人们竞相模仿的对象。目下传世的所谓王羲之的书帖以此类为主。行书在书家目中有崇高的地位。

二王书迹历代宝之,梁朝大同中,梁武帝敕周兴嗣撰千字文,大约采用集模的方法:“武帝周兴嗣撰《千字文》,使殷铁石模次羲之之迹,以赐八王。”梁武帝的主要目标是使其孩子方便学习《千字文》,让殷铁石从王羲之之书迹中模出一千个完全不同的字迹。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和尚经常临习《千字文》,有八百本之巨,分施浙东各寺,所采用的底本,大约就是梁武帝从王羲之之书迹中模出的集字本。日本天平胜宝八年(756)六月二十一日圣武天皇“七七祭日”时所奉天皇生前珍玩的帐单《东大寺献物帐》载:拓王羲之书二十一卷,其中第五十一卷有“真草《千字文》二百三行。浅黄纸,绀缕褙,绮带、紫檀轴。”(图4)在传世碑帖中有一种是所谓的隋代智永《集王羲之字告墓文》,文行楷书,有王字风格,其中真伪尚不得知,如是当是最早标明的集王字者。

《晋书》修成时,唐太宗特地亲自为王羲之作传,以彰对王羲之的敬重。贞观二十年唐太宗用行书亲自撰写《晋祠铭》,旨在宣扬李氏自太原兴兵,兴邦立国的丰功伟绩。另,P.4508号敦煌卷子为《温泉铭》(图5),据研究,文中有“朕”,并不讳“民”等字,字体与《晋祠铭》相异,故以为是唐太宗亲笔所书。敦煌残拓,应是唐人剪裱,末有“永徽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圜谷府果毅儿(下阙)”墨书

一行。用行书书碑的这些信息对当时社会有很大的引领作用。素与宫廷交好的弘福寺对这些信息了如指掌,所以才有用集王羲之书《圣教序》的举动。采用流行并便宜的楷书镌碑是一个正常的思维,鸠集行草书制造出一篇完整的碑文,却是一颇有难度的新选择。

经过太宗的精心搜集,初唐时所谓王羲之法帖已经达到二千多卷,其中行草占居大半,因此集字只能以行书为主,兼用部分楷书、草书。虽然宫廷收藏丰富,但要从卷帙浩繁的手卷中找出每一个可能采用的字迹,并组成一篇宏文巨制,是件相当有难度的事。怀仁集书所用王帖后人有一些比对,清人翁方纲以褚摹本《兰亭序》为底本指出有三十七字与《集王圣教序碑》有七字、两本通者十四字。今人喻蘅所持标准较为宽松,所列有八十八字与前者相关或相同。曹宝麟的搜集范围除传世《兰亭序》外,广及《何如》《奉橘》《得示》等十余王字帖,增十多字。王家葵等通过对一本传为唐初模《千字文》比较,指出《集王圣教序碑》中见于《千字文》的字约有四百零二字之多,并称尚有一些字迹是利用《千字文》拼凑起来的。

煞费苦心仔细地搜寻,并不能保证每个字都是来自王羲之的笔迹。王羲之的书法在本人在世的年代即有人临摹,有时候连他自己也难以分辨。

将全部字拣选出来,怀仁等接下来要面对的困难,就是如何将形体、大小各异的字体,摆布到同一篇章中去。因此,集字上石时不得不按照一定比例缩放,在视觉上有大小适度的协调。整个集字活动肯定费时耗力旷日持久,但《三藏法师

传》中并没有所费时间的记录。关于怀仁,《宣和书谱》云:

释怀仁,不载于传记,而书法家或能言之。积年学王羲之书,其合处几得意味;若语渊源,固未足以升羲之之堂也。然点画富于法度,非初学所能到者。作为一名弘福寺僧人,怀仁在佛学上并无任何贡献,只是书法家或能知道一些情况。怀仁最善长者当然是集字,除了《集王圣教序》外,他还集晋司马孙绰的《兰亭诗后序》(图6),录文收在桑世昌《兰亭考》,书帖收入董其昌所编《戏鸿堂法帖》全文。

不过《集王兰亭诗后序》后款识云:“乾封二年十月廿七日弘福寺沙门怀仁集写晋王右军书。”这件款识如果不误的话依然提供一些重要信息。一是乾封二年(667)十月二十七日所集《兰亭诗后序》,时间上要早于《集王圣教序碑》咸亨三年十二月八日(673)五年时间。此时,高宗已为皇帝。第二,标明是“弘福寺沙门怀仁集写晋王右军书”。“集写”的方式也透露出《集王圣教序碑》的集字模式,应当也是由怀仁集写。怀仁所集《圣教序》的原本或许在北宋时仍保留在宫廷内府之中。《宣和书谱》载怀仁书迹,其中有行书《圣教序》。

董其昌在《戏鸿堂法帖》中亦收有怀仁《集王圣教序碑》,并且标题作“怀仁圣教序真迹”,或表明是用怀仁书写的真迹刻帖。宋人有记载:《兰亭修契前叙》世传隋僧智永临写,《后叙》唐僧怀仁素麻笈所书,凡成一轴。现存所谓唐模《兰亭序》中并无怀仁所模写的《兰亭诗后叙》,进而使我们了解到传世《兰亭序》摹本的复杂性,并非流行说法那样简单。

唐太宗《大唐三藏圣教序》及太子李治的《述圣记》问世以后,获得迅速传播。按照规定,《圣教序》《述圣记》二文都要抄写于玄奘译经之前。敦煌P.2323文书抄录于玄奘译《能断

金刚经》前,由杜行凯抄写于贞观二十二年十月,也就是说《圣教序》《述圣记》颁布之后两个多月,就被迅速地抄录于佛经之前,传播速度令人震惊。

褚遂良具名书写的《圣教序碑》曾分立于弘福寺、慈恩寺两处。太宗驾崩,高宗即位,褚遂良被弹劾,左迁同州刺史。褚遂良回京后,将太宗、高宗的两篇文章刻碑上石,只是被署其不同时期的职官。另传有褚遂良书《同州圣教序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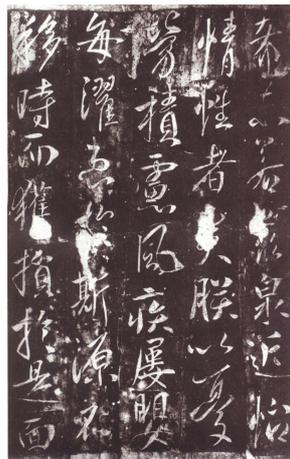
弘福寺怀仁集《圣教序》,现存碑文称集字碑立于高宗咸亨三年十二月八日,相较《雁塔圣教序》又晚十七年。那么此碑是否为怀仁等所集弘福寺原碑呢?据唐韦述所著《两京新记》载弘福寺(弘福寺):

寺内有碑,面文,贺兰敏之写《金刚经》;阴文,寺僧怀仁集王羲之书写太宗《圣教序》及高宗《述圣记》,为时所重。韦述《两京新记》约成书于开元年间。距离弘福寺怀仁等集字立碑不过几十年,所述可信。值得注意的是怀仁集王字《圣教序》《述圣记》仅在碑石的背面,正面则是由贺兰敏之书写的《金刚经》。弘福寺所邀《金刚经》书写者贺兰敏之亦为一时之权贵,也是弘文馆学士。弘文馆学士当以书法见长,贺兰敏之应弘福寺之邀书写《金刚经》,或为一位重要书家。贺兰敏之替弘福寺书写《金刚经》,显然应在此时间点以前。表明怀仁《集王圣教序》,在咸亨二年以前即完成。现存碑中内容并非与《两京新记》所载为同一版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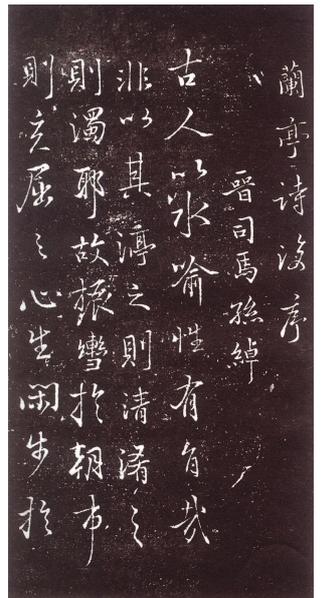
不过,很有可能韦述是将两块碑混记一块,贺兰敏之所书《金刚经》元代时仍在,“《金刚经碑》,唐武敏之正书。碑以麟德二年(665)立。在文庙。”武敏之即贺兰敏之。

在与弘福寺相邻的千佛寺,似乎也有一通《集王圣教序》的碑石。张彦远《历代名画

(下转5版) ▶



▲ 图5 唐太宗《温泉铭》拓本



▶ 图6 怀仁集《兰亭诗后序》